

全球化：中國與日本的問題意識

◎ 秦 漢

林振江、梁雲祥主編：《全球化與中國、日本》（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與西方的緊張關係構成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歷史主題。但隨著新世紀的來臨，全球化話語在中國得到熱烈的擁抱，且每每被宣稱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而種種「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預言和「實現雙贏」的大話就更製造出了如醉春風的氛圍。其實，全球化所指稱的國際性社會變遷，其推動者是西方發達國家；所以，相對於那些辯證無比但難免一廂情願的空談，保持嚴肅的問題意識才是思考和應對全球化的必要姿態。2000年3月，有中日兩國學者參加、以全球化為主題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日本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報告和論文在會後分別用中、日文結集出版，為輿論和學術界所注目。

討論會是根據日本學者的建議以全球化為切入點展開研討的，而從雙方的報告和論文來看，兩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存在深刻的差異。在中方的特別演講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融資渠道、技術引進機遇和在人才流失、就業壓力、企業競爭等方面造成的挑戰成為思考全球化問題的注意點，並相信只有開放帶來的壓力才能促成「真改革」。這代表著發展主義的全球化問題意識，也反映了從80年代「改革開放」到90年代「開放改革」的發展觀的轉變。總之，關注自身發展問題的學術方向感主宰著中國的全球化研究。而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的論文則幾乎沒有全球化的視角，仍是在有利於「地區安全與穩定」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一般性議論中表達著加強中日關係或發展中美日三邊合作的願望。但這種願望的學術意義恐怕是值得考量的，因為它們缺乏充分直面中美日關係問題的實證分析。對於中日關係而言，應該探討化解中美之間緊張的途徑以改善中國在處理中日關係時的地位，研究適當解決戰爭責任問題的可能方式以從根本上建立相互尊重、信賴心理基礎；否則，日本利用中美關係的緊張對中國保持一種優勢姿態，而中國不能不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右傾動向提出批評，但日本卻表現出抵制的情緒，這種「冷友好」的尷尬狀態難免會持續下去。

如果說中國學者缺乏以全球化視角思考中日關係問題的問題意識與自覺，那麼日本學者則顯示了以全球化話語策略引導中國超越與日本的「歷史問題」糾葛而發展地區合作這種處理中日關係問題的努力；也就是說，他們思考全球化的問題意識是明確、直接並且有著強烈的國際關係利益取向。在討論會上，日方籌備委員會負責人致辭說：要在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主義背景下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國際關係及日中關係。而日本駐華大使的致辭更突出了「二十一世紀亞洲的日中合作關係」的視點，希望探討以超越雙邊關係的日中合作來為亞洲地區的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進而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但作為處理日中關係的第一線外交家，他同時特別強調了「兩國間的相互理解不夠充分」這一「令人遺憾」的問題。日本學者則作出進一步的學術表達，稱「相互依存的發展」尤其需要「相互理解」，並且也不無遺憾地指出：兩國

領導人對「二十世紀的問題希望在二十世紀解決」這一點的意見是一致的，但現在的日中關係還沒有構築成充分信賴的關係。那麼，在日方看來，不利於中日關係的「相互理解不夠充分」問題究竟是甚麼呢？正是民間存在著深刻對立而官方卻刻意曖昧化的「歷史問題」。這可以從同日本駐華大使1999年3月在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的演講中得到印證。那時，他不僅同樣強調全球化形勢下兩國應該致力「貢獻於亞洲與世界的日中關係」即「世界中的日中關係」，而且針對中國要求日本正確處理「歷史問題」，他表示不可否認日本對過去的錯誤和給亞洲國家帶來的巨大損害感到歉疚並作出了反省。總結日方的觀點，就是：中國應該充分理解日本在反省歷史的基礎上已經成為和平、民主國家，不要因為日本的右傾保守思潮而以「歷史問題」相責攻，應該發展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來應對全球化的新形勢。而關於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區域合作這一發展中日關係的正途，日本學者提出了通過建立地區機構在國際制度與各國政府間發揮緩衝作用以趨利避害的「全球化適應戰略」，描繪了形成日中韓軸心以推動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的前景。可以想見，對於發展主義價值觀居於政治話語主流的中國來說，這些理論還是有魅力的。

不過，正如討論會會場被一位「闖入者」追究日本對南京大屠殺態度的責問打亂所象徵的，中日關係在場面上的友好氣氛是脆弱的——如果人們不刻意掩飾或迴避「歷史問題」的話。但事實證明，掩飾和迴避的結果是「相互不理解」，而且會引發政治緊張和社會思想分裂——90年代以來，與東亞其他戰爭受害國家的情況一樣，中國的民間索賠活動正在獲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支持，並且在美國和國際人權運動的法律援助下開始了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跨國訴訟；在日本，批判政府逃避戰爭責任的「克服過去」運動得到許多市民團體的響應，與右傾保守思潮構成了深刻的思想衝突。或許與上述「事件」的刺激有關，日本學者在日本版文集的前言中雖然沒有觸及「歷史問題」，但鄭重地提出要反思邦交正常化以後「友好的本質」，認為「那種友好」有著「當權者的獨佔物」、服務於「反美」目的和「商業主義產物」等多面性。他們意識到中日關係的「複雜化」，即由於兩國關係已經由過去由政府中心轉變到更加廣大的範圍，很容易發生摩擦。其實，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了作為一個癥結的「歷史問題」，但由於雙方都沒有正視「歷史問題」的「戰爭責任問題」性質，結果「相互理解」便幾乎成了一句不著邊際的空話。

那麼如何探索實現中日兩國真正「相互理解」的路徑呢？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認識到，戰爭造就了政治群體和民族國家，戰爭決定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中華民族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他們的苦難得不到最基本的人道主義體恤，那麼從作為政治和文化單位的民族整體層次而言，中日兩國難以找到道德信任和人格平等的真實感覺。在近現代史上，日本第一次「脫亞」成為帝國主義強國，其所主張的「亞洲主義」給亞洲帶來了戰爭災難；而第二次「脫亞」加入西方陣營則逃避了對受害國家的戰爭責任，以致亞洲仍然存在著阻礙民族和解的「戰爭責任問題」。那麼，日本現在主張「地區主義」的目的和可接受性能不令人懷疑嗎？在帝國主義的文化態度和殖民主義的價值觀沒有經過嚴肅的政治過程受到審判和清算之前，全球化語境中的地區主義的面目當然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總之，亞洲的歷史是分裂的歷史，而侵略戰爭受害國民眾的索賠要求不斷遭到拒絕的案例，仍在無情地延續著分裂並證實著克服分裂歷史的艱難，當然也反證了政治主義、經濟主義、國家主義價值觀主導的戰後外交的某種失敗和後遺症存留。「世界和亞洲的中日關係」概念固然可以作為避免雙邊關係容易糾纏「歷史問題」麻煩的策略，但其超越「戰爭責任問題」的有效性還有待考驗；因為政府間的合作欲望更多地是反映著政治家的生存理性，可合作本身就必然要涉及兩國民眾相互對視的現場了——這便是中日關係「複雜化」的要義。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冬天，日本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卸任告別北京前說：「只有不再需要使用友好這種

外交辭令時，才說明日中關係成熟了；但目前還必須用『友好』來維繫雙邊關係。」既然日本學者和外交家都已經對「友好」表明了審視的態度，那麼作為中國學者，如果研究中日關係或地區合作，難道還不應該考慮在新的問題意識下把反思戰後歷史的實證研究作為學術活動的起點而重新出發嗎？在全球化這一陌生的知識空間裡，中國學者是像歷史上曾經的那樣反客為主般地作必然論之類的學舌，還是把握自己保持一種審慎的批判立場，相信這其中並不見得有甚麼難以抗拒的宿命，而在於我們作怎樣的選擇。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1年12月號總第六十八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